

屠基远：数度潜伏的革命战士(下)◆ 屠新建

再度潜伏 迎接解放

工运领导人张祺、陈公琪等知道父亲屠基远在商务印书馆时认识王先青，遂决定让父亲去找王先青，打入国民党内部。王先青是上海市商会里的国民党市党部委员，又是杜月笙的徒弟。他将父亲介绍给当时的卢湾区区长章鹏若。1946到1947年，父亲打入上海卢湾区民政局，任户政股主任。他曾为地下党提供过各种“身份”证件，并随时向党组织报告敌人内部动态。不久党组织又决定父亲去“竞选”伪区长，虽然没有成功，但暗中扩大了党的影响。父亲先后派两个党的外围积极分子黄继茂、朱钟麟打入区公所，1946年发展黄继茂入党。但不久被敌人察觉。

1947年10月，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下令逮捕父亲。父亲在组织的安排下，及时隐蔽，避开了敌人的搜捕，辗转南京。党组织派毛齐华转交给父亲路费和联络关系，将父亲派往香港。

1949年2月，上海解放前夕，张祺再次要求父亲潜回上海，负责国民党民政系统的秘密接管和组织工作。父亲冒着生命危险回到上海，找到了仍在民政部门工作的朱钟麟等人，了解情况后，布置他们收集民政局及各区局的名单、地图、资料，将“约法八章”等党的文件，分别寄送给各区人员，进行政策宣传，并要求他们保证户籍册完整等待接管。他每周要同这些人员秘密联系二三次，了解工作情况和国民党动态，然后再编制宣传内容，派已被策反的一批国民党政府的公务人员去印发。当时白色恐怖十分严重，国民党

每天在杀人，用重金悬赏鼓动保甲长搜捕共产党人。这些被策反过来的国民党政府人员都是冒着杀头的危险，为上海解放做了很多工作。国民党逃离上海前夕，下令烧毁户籍册及破坏身份证存根，但在党的政策的感召下，很多职员自觉出来保护，保全了30个区的400万市民的户籍资料 and 一大批重要的敌伪档案，为新上海的民政建设做出了贡献。

当时父亲是秘密到沪，既不能同家人联系，又不能在公开场合露面。4月到5月，父亲住在周祥生家里，当时苏州无锡已经解放，父亲谎称是从苏州逃出来的。在周家，父亲对周祥生和爱人鲍颜和进行教育，要他们为革命贡献力量。他俩也千方百计地掩护我父亲，直到5月25日上海苏州河南部地区解放。解放后，他俩都入了党。

上海解放后，父亲又穿上了军装，成为军管会的政务接管委员会秘书主任，参与接管30个区的民政局、参议会。6月下旬，上海市人民政府民政局成立，曹漫之任局长，黄序周任副局长，父亲为秘书主任，1950年5月被提升为副局长。

“潘案”蒙冤 “文革”磨难

建国初期，父亲兼任市政法委里弄工作委员会主任。他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充分利用积累的社会人脉，和他的同志们一起创建了上海城市居委会——“里弄政权”建设的治理模式，其中的工作原理至今还在沿用。

自1950年起，遍布上海的11155条里弄逐步建立了居民委员会。到1954年1月，全市共有居民委员会1847个，居民小组约有3.6万个，居



■ 1943年，屠基远夫妇合影

民委员会委员95284人，形成了一个自上而下的覆盖到社会基层的组织网络。

父亲写的《城市居民委员会工作》一书，从主导思想到组织结构、地位、性质、任务及人员配备、工作方式、经费筹措等，都有详尽缜密的论述。该书是我国群众基层自治组织的第一部专著。

之后，他调任市政协副秘书长。谁知，厄运也随之到来。1961年，父亲被停职了，说是和“潘汉年案”有关。后来才知道，其实是莫须有的所谓的“历史问题”：父亲在地下党的时候，打入国民党内部，奉党组织之命竞选卢湾区区长，兼任了20多天的国民党区分部的书记，但没有去上任过。这一情况已及时向党组织汇报过，想不到却成为“历史问题”，“文革”中还作为所谓“大叛徒”罪证。

一生一首翰墨诗——周慧珺传

李静 张亚圣

十八、书坛回春

1972年，一个重大的转折即将改变上海书坛的发展轨迹，预示着书法运动的复兴。那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毛主席在接见来访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时，发表了关于“学一点历史，学一点哲学，学一点书法”的讲话，并赠给随同田中来华访问的日本外相太田正芳一本怀素《自叙帖》的影印本，堪称国宝。

说到那个时段的中日书法交流活动，就不得不论及日本书法在这百十来年的精进。大家知道，中国书法是日本“书道”的母源，这是毋庸置疑的。在江户时代之前，古代日本人称书法为“人木道”或“笔道”。西晋年间，一个名叫王仁的百济国（今朝鲜半岛一部分）使者扬帆渡海来到了日本，被日本天皇任命为皇子菟道稚郎子的老师，随同进献了孔子的《论语》十卷和《千字文》一卷等书籍，作为皇子的教材，这些系统的汉字和汉文的典籍使日本人第一次接触到了中国的书法。此后中国的汉字在日本生根发芽，书道初见流行。

到了明治维新时期，诞生了日本近代书道的泰斗级人物日下部鹤鸣以及岩谷一六、松田雪柯和稍晚时期的中林梧竹、西川春洞、宫岛咏士、北方心泉等。明治十三年，也就是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我国著名的金石书法家杨守敬东渡日本，随身带去汉魏六朝隋唐碑版无算，日下部鹤鸣以及岩谷一六听闻后，多次到清国公使馆中与其观碑笔谈，彻夜不休，因而顿悟，风格大变。

这些日本书道家们以及他们的再传弟子在中国近代书法的基础上扬长补短、兼容并蓄，注重行草、篆隶，交构成了日本近代书道的中流砥柱，成为日本近代书法的先驱开拓者。因此，在漫漫一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日本书道有其自身文化的渗入与承转，但中国书法始终扮演着其精神导师的角色，领导

着日本书道的前进方向。

但历史是在不断向前发展的，不进则退。中国书法在近代已有所衰弱，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更是裹足不前。

据周志高回忆：“自1972年开始，就有日本人到上海参观旅游。因工作关系，我接触到大量日本人，对中国书法，他们有两个基本观点：一，他们认为中国是书法的母国，对古代书法家非常崇拜，对《兰亭》等书法名胜也向往；二，他们认为当代中国落后，穷，书法在走下坡路。他们看不起中国的书法家，甚至放言，如果中国想把书法搞上去，就得去日本学习，他们那里有研究生和博士生。态度很傲慢。”

此情此景正是当时最真实的文化写照，联系起毛主席要求“学一点书法”和他老人家一贯不服输的倔强气概，此中的深意也就不难理解了。于是，政策的相对宽松也就极大地释放了学书者的创作热情，引发了持续数十年的“书法热”。

同年，书法家徐伯清（1925—2010）敢为天下先，大胆尝试举办书法展览。在其积极斡旋下，上海画院和南市区文化馆、园林局共同在蓬莱公园举办了书法展，引起了广大书法爱好者的热议。之所以要提这次展览，在于这是“文革”以来上海书坛影响最为广泛、质量最为一流的全市性书法展览。

展览会由王个簃老先生题写“书法展览会”隶书匾额，延请胡问遂手书楷书前言，同时集中展示了任政、赵冷月、单晓天、翁闾运、徐伯清、周慧珺、吴建贤等一大批沪上知名大师及中青年优秀书家的一百多幅作品。参观者蜂拥而至，数日不绝。

1974年，蓬莱公园又举办了一次书画展览会，除了书法家外，还云集了刘海粟、陆俨少、程十发、关良等名师画作。这两次高质量的书画展览会使得当时的蓬莱公园声名鹊起，为大众百姓提供了一个欣赏艺术、欣赏美的公共场所。

经历了一系列的展览、展示后，周慧珺也凭藉出挑的书艺在青年书法家中小有名气，受到了出版刊物的瞩目，《人民中国》就刊登了周慧珺书写的行书——杜牧《山行》。

5. 英国政府正式出兵中国

按照林则徐预定的禁烟策略，是只禁绝非法的鸦片贸易，决不牵涉到其他一切合法贸易；因此他不但允许英国以外的其他各国商人具结进口，就是以前经营鸦片贸易的英国商人，只要能悔悟自新，同样允许他们具结进口。林则徐的这个策略是完全正确可行的，也是行之有效的；但不料道光帝得到九龙、穿鼻数次战胜的奏报后，竟下令永远停止与英人通商，将所有英国商船尽行驱逐出口；林则徐当然不敢违抗道光皇帝的旨意，令自12月6日起封闭口岸，断绝中英两国通商关系。虽然查理义律以后又曾具稟请求恢复通商，林则徐仍不得不予以严词拒绝。道光帝甚至以为禁烟事了，改任林则徐为两广总督，调邓廷桢为闽浙总督。

道光帝这种错误的指导方针，主要仍是根源于清朝统治者一任妄自尊大和盲目排外的闭关主义思想；它不但破坏了林则徐的禁烟策略，更导致和扩大了战争的危机。当时甚至还有代表极端闭关主义思想的大官僚曾望颜（顺天府尹），奏请恢复执行海禁，连英国以外的其他各国商船也一律不准进口贸易；幸而林则徐据理驳斥，这种荒谬的主张才没有见诸实行；因此战争仅限于中英两国，没有扩大到其他国家。

当1839年（道光十九年）3月广东禁烟运动刚起时，英国政府还力求避免与中国发生冲突，并训令查理义律不得轻举妄动；以后因查理义律数次请求政府出兵中国，又自率兵船径向广东水师挑衅，中英两国事实上早已进入战争状态；更加清朝政府下令封闭广州口岸，断绝中英通商关系，严重损害了英国的利益，英国政府这才决定派遣侵略军前来中国。

1840年2月，英国政府任命查理义律为对华全权外交代表，又派乔治义律（George Elliot）为侵略军司令，4月向国会提出军费支付案。当时国会议员中多有反对出兵中国的，他们认为因鸦片问题而向中国开战，是一件极不名誉的事情；主张政府自动禁绝不名誉的鸦片贸易，并和鸦片商人断绝关系。但政府当局提出出兵理由，一为报复

中国对英国领事和英国的侮辱，二为赔偿英商所受损失，三为保障英商身体财产的安全，而对鸦片贸易应否禁止一事，完全不加考虑。经过国会三天的激烈辩论之后，终于仅以九票的多数通过了军费支付案，正式出兵中国。

英国侵略军系调集原驻印度和南非的陆海军组成；陆军由乔治义律率领，海军由伯麦（James John Gordon Bremer）率领，计兵船二十六只，兵士四千人，于6月间驶抵广东沿海。广东方面，林则徐早就料到战争无法避免，英军将要进攻广州，所以在军事上已有适当布置。除了在粤江口内安设木排铁练、添置炮台炮位以外，并自葡萄牙、美国购进五千斤至八九千斤大炮两百多门，排列内河两岸；又整顿水陆两军和募集水勇五千人，日夜演习海上攻防战事。

战争开始以后，林则徐更广泛发动民众反抗英国侵略军。一面组织乡勇守卫本土，一面悬赏奖励民众杀敌，约定如英兵登陆，允许人人持刀痛杀，赏格是每杀死英兵一名赏银洋一百元。

在这种情形之下，英国侵略军在广东方面无机可乘，就改向中国北部行动。全军除留一小部分封锁粤江口、阻止船只进出外，其余在6月底由查理义律偕同乔治义律率领沿海北犯。

当英国侵略军到达广州时，林则徐就曾经迅速通知沿海各省注意，道光帝得奏，也曾令各省督抚严防。不过这些督抚，除了闽浙总督邓廷桢属于抵抗派以外，像直隶（今河北省）总督琦善、两江总督伊里布是投降派的首领，还有的多是封建腐朽官僚。因此从浙江到直隶海岸数千里，毫无无防守准备。定海等海岛不必讲，就连距离首都北京极近的天津，防兵也不过八百人左右。

英军在7月2日同时驶抵厦门和定海两处海面。厦门方面，经邓廷桢督水勇迎战，英军不久即行退去。定海方面，英军于7月4日致书定海知县姚怀祥，限一小时内献地投降，7月5日就遂行攻占。7月28日英军又自定海北犯，8月11日驶抵大沽口外。

鸦片战争始末

司马牛

